

国内学界近三十年俄国史研究之思考

张建华

一、俄国史研究近三十年的学术成就回顾

自从18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中国的俄国史研究经历了四阶段：

第一阶段：相互观察和散点记录时期（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以游记为主。

清代名臣张鹏翻的《漠北日记》（一名《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图理琛的《异域录》、方式济的《龙沙纪略》、松筠《绥服纪略》、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和《俄罗斯事辑》、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19世纪下半叶在西学热中，林则徐翻译了《俄罗斯国总记》，魏源著有《俄罗斯盟聘记》，道光年间进士何秋涛广泛考订中外资料编修了《朔方备乘》等，为后人研究俄罗斯问题、中俄关系史等问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在何秋涛之后又有梁启超的《俄国大彼得改制考》，其研究已初具学术性了。

第二阶段：社会关注和学术启蒙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以前）。以翻译为主。

20世纪初俄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变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联袂而来，吸引了中国学界的关注。鲁迅称之为“中俄文字之交”。^①1903年，上海出版了两本《俄国史》译著，拉开了20世纪研究俄国史的序幕。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1907年12月），曾介绍民意党领导人之一苏菲亚·别罗夫斯卡娅的事迹。

1932年国民政府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推动30年代介绍研究苏联问题的第一次高潮的到来。1930年建立俄事研究会，创办了专门刊物《俄罗斯研究》月刊成立了由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担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1935），创办中苏文化杂志社（1936），出版《中苏文化》月刊和中苏文化研究丛书。这10年间编、译著数量占50年间总数50%左右。先后出版了何汉文、姜壮行、顾谷宜编著的《俄国史》，为国人撰写俄国史的首批著作。

第三阶段：学术积累与研究初萌阶段（1949年后至1978年前）。翻译和编著并举。

新中国初期出于外交上采取对苏联“一边倒”政策和学习苏联的考虑，直至50年代掀起翻译介绍研究苏联的第二次高潮，这10年间编著、译著数量占30年间同类书籍总数60%左右。

50-60年代，涉及俄国（苏联）问题的专业研究机构陆续建立。195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世界历史研究组，1964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所（197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下设社会主义史研究室（后更名为苏联东欧史研究室）。196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苏联东欧研究所（与中联部双重领导），1981年归划中国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和上海等省市科学院系统，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央党校等高校系统，外交部和中联部等党政机构也建立了专业研究机构。

此时已有一些研究著作问世，但多偏重于中俄关系史。60至70年代出版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等著作和资料集，烙下了中苏从意识形态论战演化为边境冲突时代的印记。

第四阶段：独立研究和成果显著时期（1978年至今）。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呈显著提高趋势。

^①“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鲁迅：《中俄文字之交》载《文学月报》（1932年12月5日）第1卷第五、六号合刊）

国内的俄国史和苏联史作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国别史学科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在这此时期内完成重要研究课题的确定,部分重要史料的翻译和整理和研究队伍初建等工作,在国内的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意义的《俄国通史简编》(刘祖熙、孙成木、李建主编,2卷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苏联史纲1917-1937》(陈之骅主编,2卷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苏联历史辞典》(陈之骅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的编纂工作即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1985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全国性的苏联东欧史研究队伍的建立。

20世纪80-90年代,为了借鉴苏联改革经验,在中国掀起俄国(包括苏联时期)史学研究第三次高潮。80年代以来,出版学术研究著作第一次开始超过译著。1980-2000年的20年中,研究著作超过同期译著50%以上,为80年代以前70年间编著数量的近1倍半。

其中,《巴枯宁评传》(李显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克鲁泡特金传》(陈之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苏联经济政治体制七十年》(刘克明、金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俄罗斯文化之路》(姚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苏联兴亡史》(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俄罗斯馆纪事》(蔡鸿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苏联剧变研究》(江流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江流、陈之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陈之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为该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既充当了普及苏联历史知识和总结苏联改革教训的双重任务,因此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学术双重影响。

2000年以来,中国的俄国史研究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俄国史研究的第四次高潮。

这是因为:第一,改革的不断深化,提高了学者们的思想认识;学术研究环境进一步宽松和富于社会与政府的理解。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一些大学和科学院新建或调整了俄国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第二,苏联解体后大量原始档案的公布,为俄国(苏联)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价值的资料。有更多的学者直接去俄罗斯收集资料。《苏联历史档案选译》(沈志华总主编,34卷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即在此时出版。第三,新一代的俄国(苏联)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在逐渐壮大起来,专业研究人员来源多元化(赴俄留学和国内培养)和规范化(多接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专业训练)。^①第四,研究课题呈多元化和细碎化特点,涉及俄国(包括苏联时期)政治史、俄国(包括苏联时期)经济史、俄国(包括苏联时期)外交史、俄国(包括苏联时期)思想史、俄国(包括苏联时期)社会史、俄国(包括苏联时期)日常生活史、中俄(包括中苏)关系史、俄国汉学史等领域。

在经历了收集和翻译资料、编写通史、开展专题史研究、培养研究生的过程后,至今,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在国内及国外史学界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俄国史和苏联史的专业研究队伍。它的主要标志是:通史性的俄国史和苏联史基本出齐;在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和政治思想史等方面涌现出一批有学术功底和见解独到的专题史著作;高等学校中开设了一系列的俄国史和苏联史的通史课和专题选修课;在国内较早地建立了一批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及其会员与苏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有关的学术机构建立较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等,其中包括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两任会长均担任国际史学会十月革命史执行局共同主席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俄国史学界就苏联大清洗的人数和影响展开了一场持续性的学术辩论。^②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苏联史这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公开进行的第一次学术争鸣。一方面说明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另一方面说明俄国史学者问题意识的强化,占有资料的广泛和学术着眼点的多元化。

代表性著作:《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刘祖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苏联兴亡史论》(徐葵、李静杰、陆南泉、姜长斌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① 但是国内学界俄国(苏联)史研究队伍就人数和质量方面比较其他国别史研究队伍均显严重不足。

^② 这场学术争鸣主要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吴恩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中央编译局郑非凡研究员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教授之间,相关著作多发表于1996-2007年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和《学习时报》等权威学术刊物之上。

2002年版)、《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王晓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俄国史》(张建华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马龙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黄立弗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斯大林与冷战》(张盛发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版)、《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张广翔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俄国汉学史》(阎国栋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俄国斯拉夫主义》(白晓红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郭春生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罗爱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苏联史论》(吴恩远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张建华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自20世纪90年代起组织翻译并出版“苏联丛书”;自90年代中期起,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十余年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并出版“俄国宗教哲学”丛书,为俄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

二、研究偏差与存在问题

近30年国内俄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果斐然,功劳卓著,可喜可贺。然而,喜悦之余,认真思考后,仍有些许遗憾和不足之处,这里略陈一二。

1、需要进一步宽松苏联史学术环境,摒弃政治化和概念化,让将学术研究回归本原。

以十月革命史为例,十月革命史学曾经是苏联史学的“宏大叙事”和核心问题,也是极其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国内学界的有关研究自始致今明显地体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是强烈的政治性倾向。国内学界多围绕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影响的争论,但多在关键时刻以列宁有关论述一语定乾坤。列宁和斯大林有关著作同时身兼了政治方向、学术观点和重要资料的三重作用。第二是明显的模式化特点。相关研究几乎皆从十月革命的经济根源、政治条件、领袖作用、当时影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展开。因此,尽管在斯大林去世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为两国学界诟病,但以后的研究水平和有关结论并未超出此书。国内学界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十月革命爆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争论,试图冲脱上述怪圈,但政治性倾向仍然明显,学术准备严重不足,并形成了新的模式化。从一定程度上讲,十月革命史变成了国内学界不愿意触动的史学问题或不敢于触动的史学禁区。或者说得再形象一些,十月革命史问题变成了史学研究的一个“花瓶”,只是到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纪念周年时再略加修饰后摆出来。

在笔者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而非历史影响)已为列宁等经典作家所论述,我对此表示完全的认同。但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十月革命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影响(而非政治影响)却未得到充分地、正常地和学术化的研究和发掘。在9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否在隆重地和热情地纪念政治视野下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同时,谨慎地和科学地思考学术视野中的俄国十月革命问题,肯定以往研究中的成绩和突破,正视已为众目所见的缺陷和不足,试图在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和资料等方面有所创新呢?

对于苏联史研究,能否少一点政治性,多一些学术性?能否少一点神话,多一些实际?能否少一点功利性,多一些创新性?能否少一点旧方法,多一些新角度?能否少一点老资料,多一些新佐证?

2、国别史名称混乱,忽视俄国历史传统与苏联历史的内在联系。

国内学界在俄国史称谓方面长期存在混用和混乱的现象。

国内学界通行将从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至1917年二月革命的帝俄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俄国史,将1917年二月革命至1991年底的苏联时期的历史称之为苏联史。如果按时间顺序如此称呼是可行的,目的在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差异。但如果将其置于国别史视野下,特别是与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日本史等并列时,又做如何称谓呢?

一种作法是直接此入苏联学界的称谓,统一称“苏联史”(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于是就出现了苏联古代史、苏联近代史和苏联现代史极不科学的称谓。^①国内早期设立的俄国史研究机构一般都为“苏联史研究所(室)”(苏联研

^① 代表著作如苏联科学院院士潘克拉托娃主编、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完成的三卷本的《苏联通史》(Панкратова А.М.,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1954. 中译本为三联书店1980年版)、诺索夫主编的二卷本《苏联简史》(Носов М.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1972. 中文版三联书店1976年版)和波诺马廖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史——从远古至今》(Пономарев Н.М.,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М1966)。

研究所(室), 1985年成立的全国专业研究机构也称“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此种作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基本被中国学界废弃。^①

一种通行作法是称“俄苏史”(即俄国苏联史), 然而既不科学, 也颇费解。一个国家的通史何以出现两个并列名称呢? 其实“俄苏史”原本是专指1917年11月7日成立、1922年12月30日成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并随1991年12月26日解体而不复存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История РСФСР)。

另一种较常见作法是称“苏俄史”, 同样是不甚科学, 原意正确解释是“苏维埃俄国史”。

还有一种作法是称“俄罗斯史”。然而“俄罗斯史”(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原本专指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无法涵盖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多民族、多区域、多宗教和多文化的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

其实,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学界早已统一自己国家历史的称谓, 即统称“俄国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内容包括了从远古至20世纪末的俄国历史(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②, 在划分阶段时“帝俄时期”(перио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和“苏联时代”(период СССР)。

因此, 我建议统一称“俄国史”, 将其作为学术概念固定下来。这样既强调俄国史与苏联史的通史关系, 更强调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和传统因素的继承关系, 亦有利于国内学界编写《俄国通史》和大学科研机构俄国史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

我认为,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继承性, 它无法因为一次或数次战争、一场或数场革命, 因为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更迭, 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被隔断。从国家和民族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 从通史的角度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 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也是通史性著作本身所固有的其他断代史和专题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长处。无论是沙皇俄国时期, 还是苏联时期, 还是今天的新俄罗斯时期, 笔者都愿意把以上所走的历程看成是历史积淀深厚、文化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民族,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 紧紧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 推动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3、帝俄时期(俄国史)研究不足, 苏联时期(苏联史)研究不广。

比较而言, 20世纪俄国史研究较多, 18、19世纪俄国史研究较少;苏联史著作较多, 俄国史著作较少。

究其原因, 与苏联史距今较近, 易为社会和政府关注有关;与多种资料来源丰富, 查找便利, 易于选题有关;与苏联史专业研究人员较多, 俄国史专业研究人员较少有关;与国际共运、科学社会主义、国际政治、政治学多学科介入苏联史研究有关。

就苏联史研究而言, 也存在着选题过于集中, 涉及范围不广。现有成果多为政治史、外交史和经济史领域, 而思想史(包括知识分子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包括日常生活史)领域研究不足或几无涉及。

而且大量研究浮于表面, 长于概念解释和理论分析, 弱于“史论结合”和“论从史出”, 有的研究甚至偏重政治注解和政策解说。这表明, 苏联史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模式的影响。

三、两点建议

第一、打破学科界限, 将俄罗斯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哲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应该有选择地引入俄国(苏联)史研究之中, 建立中国学派的“俄罗斯学”。

中国俄罗斯学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学”在中国的“本土化”, 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 必须借助于来自中国学术传统中优秀的本土资源, 将其“内化”为自信稳重的心态和有效可操作的技能, 对自俄罗斯的“俄罗斯学”和西方“俄罗斯学”辐射而来的各种信息加以自觉的过滤、消化他甄别, 对“俄风西雨”择善而从, 而不是一味偏信或一味孤妄, 坚持自己的学术思路和独立见解, 从而形成中国语境下的“俄罗斯学”。

例如, 可以借鉴语言学和文化学中常见的语言的文化伴随意义来研究不同时期俄国历史特点。澳大利亚籍的波兰学者维斯别茨卡娅认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得到集中反映, 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即是“心灵”(душа)、“命运”(судьба)和“苦难”(тоска)。“命运”судьба一词本身具有了多重含意, 如“安身

^① 但令人不解的是“前苏联”称谓在国内大行其道, 尤其常见于新闻媒体和政府文件乃至领导人言论之中。

^② 代表著作如俄罗斯科学院祖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萨哈罗夫主编的多卷本的《俄国史——从远古至今天》(Сахаров А.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1997)。

立命”（смирение）、“命中注定”（суждено）、命运（жребий）和“苦命”（рок）等，以及相应的词组，如“命运的打击”（удары судьбы）、“命运的拨弄”（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等。维斯别茨卡娅通过对以上三个俄罗斯文化关键词的分析，总结出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心态的核心特点是“情绪化”“非理性”“被动性”“关注道德”。

第二、俄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注重借鉴俄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文本资料的使用。

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史学大会特设议题“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史学地位在变化”即代表了当代国际史学界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重视。在这里我们仅从史学与文学关系的角度谈一谈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作用。

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历史学基本是历时性的研究过程，文学基本是共时性的研究过程；历史学研究主要依靠资料甄别，文学研究主要依靠文本选择；历史学研究多从历史现象入手，文学研究多从典型形象入手。但是，在两者间仍然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和影响。

在俄国历史上不乏这样文史并举的伟大著作，成书于12世纪的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和同样成书于12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都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当代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好文献’，喜好事务性散文体裁。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分。……这也给编年史的风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罗为华丽和崇高。”^①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批判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的第二部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宏文，托翁有关“历史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学科。然而，人们却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过语言文字详尽说明——不仅描述人类的生活，而且尽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②他的论断是对历史学和文学关系的最好概述。

19世纪是俄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的阶段，是俄国历史上西方先进思想大规模传播的阶段，同时也是俄国文化、文学、艺术、语言、教育、科学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世纪。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妥斯陀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笔下，成功地创作了“多余的人”“忏悔贵族”“新人”“美妇人”“当代英雄”等一系列的人物，他们既是19世纪最鲜活的俄国文学形象，同时也是同时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品德、性格、困惑、理想和追求的注释。这些文学形象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几代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上的困惑，展现了这一长时段中俄国各个阶层，包括上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意识上的急剧变动。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多余的人、忏悔贵族以及后来的积极革命者——这就是实际存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③

这些典型形象既可以丰富我们对19世纪俄国鲜活历史的理解，也可以佐证历史文献资料，并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良史”，即为“美文”；“信史”，亦称“华章”。史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文学是具像化的历史，史学是抽象化的文学。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与俄罗斯文学高度重合，相互印证，“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新人”“美妇人”“奥勃洛莫夫性格”完全是同时期俄国思想史中的“恰达耶夫们”“巴枯宁们”“赫尔岑们”“涅恰耶夫们”“普列汉诺夫们”的真实和形象的写照。

作者简介：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从事俄国思想文化史、中俄关系和俄国汉学史方向研究。

电子信箱：zhangjh171@sohu.com

^①利哈乔夫著，吴晓都等译：《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46页。

^②列夫·托尔斯泰著，盛震江等译：《战争与和平》，下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466页。

^③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页。